

七夕节的民俗文化阐释

王天鹏

(云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牛郎织女传说在中国是个经典的民俗传说。但牛郎织女何时七夕相会即牛郎织女传说与七夕节何时合二为一在学术界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七夕节具有社会性别的确认、生殖崇拜、巩固家庭的稳定等功能。在社会转型期七夕节遭到冷遇有传统的断代、社会转型的影响、西方文化的冲击、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女性地位的提高以及民俗的自然变迁等原因。

[关键词]牛郎织女传说;七夕节;民俗功能;原因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6)05-0025-(05)

自现代社会转型以来,中国传统民俗节日的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一些具有民俗忧患意识的学者纷纷就民俗节日文化的保护问题交换意见,一时间民俗节日的复兴和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成为学界和民众间的一个热门话题。七夕节作为传统民俗节日的代表,具有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本文以七夕节作为切入点,对学界有争议的牛郎织女传说与七夕的起源进行探讨,探求七夕节所蕴含的深层文化内涵,分析作为民俗节日代表的七夕节受到冷遇的原因,以期对中国的民俗节日保护问题给出一些方法性的建议,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文中偏颇之处在所难免,但为抛砖引玉,因此不揣浅陋,以就教于方家。

一、牛郎织女传说与七夕节的起源

牛郎织女名称首次出现于《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岐被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报箱。”在这里牵牛织女两星作为一种文化因素,仅是自然界中的两个星辰,和牛郎织女的故事并未产生任何联系,但是正是此文化因素,为牛郎织女传说的生成准备了潜在的文化条件。班固《西都赋》云:“临乎昆明

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进一步把爱情因素同牛郎织女传说结合在一起,而且被编织为一段恩爱夫妻饱受银河隔绝之苦的爱情悲剧。三国时期的诗文也无一提及牛郎织女相会之事,曹丕《燕歌行》:“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故限河梁?”曹植《洛神赋》:“叹瓠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从现有材料看,最早说到牛郎织女相会的可靠记载见于西晋。《玉烛宝典·七月孟秋》引傅玄《拟天问》:“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又引周处《风土记》:“夷则应履曲,七齐河鼓礼。元吉。”原注:“七月俗重是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机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荧重为稻,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这两则记载明确说牛郎织女七夕相会,并将七夕节与牛郎织女传说联系在一起。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此段文字说明,至迟在东汉末年女子于七夕穿针乞巧的习俗已广泛流传。

从以上七夕的来源我们可以看到,应是先有七夕节的乞巧习俗,再有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传说。一些民俗学家也持这种观点,如中国著名民俗学家汪玢玲就认为“人们误以为先有牛郎织女故事,然

[收稿日期]2006-06-05

[作者简介]王天鹏(1975-),男,江苏沛县人,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民俗学硕士研究生,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民俗文化与现代化、文化人类学。

后才有七夕的”，^[1]贺学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支持汪玢玲的观点，并说，因为有了“七夕”——情人相会的诸多传说，最后才把牛郎织女相会放在这样的日子，至于和“七夕”相关的乞子、乞巧、乞一切幸福的习俗均是由此生发而来的。事实上先有独立的七夕乞巧的习俗，人们为了给予其合理性的解释，逐渐融入了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

据杨琳先生考证，牛郎织女传说是晋代以后才渗入七夕节的。^{[2]287-294}也许有人会提出如下文字来进行反驳：“韩鄂《岁华纪丽》卷三《七夕》：‘鹊桥已成，织女将渡。’原注：《风俗通》云：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夕鹊首无故髡，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但后来传世的《风俗通》中未有记载，也不见于唐代各类书征引，据杨琳考证，当是张冠李戴。

一个习俗出现之后，需要一个世俗民情的解释作为其存在价值的依托，节日的内涵就更为充实，更能激发人们的兴致，节日也就更为热闹，从而才能产生广泛持久的影响，这就是世界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大都有一个动人传说故事作为起源的原因。七夕节与牛郎织女传说的结合原因也出于此。假如七夕节不依托于牛郎织女传说，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就可能没那么大，甚至有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就夭折了。“习俗传说故事中所说的习俗起因和由来，并非都是真正的起因，而是根据对习俗的看法，取其一点，按着人们的愿望和理想，编织附会了种种的传说故事。说成是某习俗的起因和由来，无非是为了增强故事的可信性，更便于流传广远而已。……至于所讲的故事是否是习俗的真正起因，人们倒是并不怎么去注意考证它的。”^[3]

二、七夕节的民俗文化功能

七夕节的乞巧习俗自东汉时期产生以来，虽历经近两千年而没有消失，但是自近代社会转型以来，其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兴起更导致以七夕节为代表的传统民俗节日的衰落。这是否就意味着它们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不能传承下去，因而可以任其衰落置若罔闻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传统的民俗节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虽然有的节日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它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精神所在。而且传统的民俗节日之所以有理由传承下去，也因为它们包含着一系列的民俗文化功能。下面我们就以七夕节为例来分析一下其所具有的民俗文化功能：

（一）社会性别的确认功能

社会性别（gender），是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学术界最近一段时间广泛运用的一个概念，为了与传统的生物意义上的性别（sex）相区分而在前面加上了“社会”两字。社会性别是指不同文化赋予男女不同的社会角色、行为准则、表现形式及象征意义等现象。^[4]传承近两千年的中国七夕乞巧习俗一直承担着社会性别确认的功能。传统的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决定了男耕女织的家庭作业模式，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伦理规范下，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劳动角色被定位为狭隘的家庭织作，社会不要求她们有多少智慧，只要手巧，做好家庭主妇就可以了。“正是在劳作过程中，个体实践了社会赋予的责任，履行了社会规定的义务，凸现了文化性别的意义，实现了社会性别的确认。”^[5]

七夕节主要是女孩或已婚妇女的节日，但也有少量男子参加。传统的农业社会对男子的期望则是能够读书求学，成为士人，读书不成，则从事传统的家庭耕作，这一社会性别的期望在七夕节中也得以体现。七夕节中的儿童裁诗、拜魁星、晒书的仪式活动则是强化男子的读书求取功名的活动，以此活动同样实现对男子社会性别的确认。

（二）生殖崇拜的功能

乞巧是七夕节最具特色的民俗活动，所以七夕节又有乞巧节之称。尽管各地乞巧活动各不相同，但流行最为普遍的则是以针穿线。能够月下穿针表面上是表现的心灵手巧，但其中暗含的则是生殖崇拜的意蕴，穿针的成功意味着交合的成功。我们经常说的千里姻缘一线牵就是指的异地男女有缘结为夫妻；“穿针引线”、“牵线搭桥”也是指的把陌生男女撮合成为夫妻。女娲造人时使用的工具也是线绳，因此线绳的生殖文化意蕴是源远流长的。古代情歌中常将男女的会合比喻为针线相连。明朝冯梦龙《山歌一·瞞娘》中甚至有这样的比喻：“昨夜同郎做一头，阿娘困在脚跟头。郎呀，扬子江当中盛饭轻轻哩介铲哩，铁线升粗慢慢哩抽。”这里将男根比喻为针线，针线之喻的意蕴不言而喻。^{[2]295}

穿针之所以在月下，并不单是因为能在月下穿针意味着更加手巧，也有生殖崇拜的意蕴。太阳称阳，而月亮称阴，是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吞月而孕的传说、梦月而孕的观念历史上非常流行。月亮作为玉兔与蟾蜍的组合体，其实也是生殖崇拜的组合。“母兔怀孕28天生小兔，也是妇女月经周期的天数，将兔子安置在月亮上并给予崇拜，无疑是古人女阴崇拜的象征。蟾蜍生殖能力强，是生殖母体的象征。”^[6]因此，每当七夕之夜，一群妇女在月下穿

针引线,祈求家族满堂、子孙繁衍的含义非常明显。

因此,七夕乞巧,虽名为乞求心灵手巧,实是女性用乞巧之名来掩饰其乞子之意的害羞心理。

(三) 巩固家庭稳定的功能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女子地位相对低下,男子可以一妻多妾,女子却必须从一而终。即使丈夫去世,也不鼓励寡妇再嫁,自古以来无数的贞节牌坊可以作为这方面的活生生的见证。除了有现实生活中身边贞妇烈女的例子可以作为效仿之外,统治阶级还编写了女性教材来进一步禁锢女性的身心,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女孝经》和《女论语》。书中宣扬男尊女卑如同天尊地卑一样的道理;主张男有重婚之义,女无再醮之夫等。因此,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她们唯有靠乞求自己心灵手巧、聪颖灵慧来换取男性的青睐,作为巩固家庭地位的重要筹码。在七夕乞求的活动中其中有两项是蛛丝卜巧和浮针试巧。若得巧,女性则欣欣然,若不得巧,则惴惴不安直至叹息哭泣。这也表现了女性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用“赌博”的方式来占卜,期望自己心灵手巧,以此来巩固自己家庭的稳定,不被男子抛弃。因此历代文人的七夕诗词多对牛郎织女的不幸和人间乞巧的女子抱以深切的同情,表达的不是牛郎织女相见的愉悦,而是经年不得相见的哀怨。

最能说明问题的则是杜甫的《牵牛织女》诗。“嗟汝未嫁女,秉心郁忡忡。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虽无姑舅事,敢昧织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义无弃礼法,恩始夫妇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圆苟龃龉,丈夫多英雄”。杜诗从反民俗的角度善意地告诫待嫁女子,在娘家要加强修养、勤学女红,不要因为未出嫁而有丝毫的懈怠,因为这都是为将来的出嫁作好准备,否则不会有好日子过。到婆家要严守礼法、辛勤劳作,尽心侍奉家人,否则,即使言语上有丝毫的差错,“英雄”的丈夫也定会打骂管教。

三、七夕节遭冷遇的原因

七夕节有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传统。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七夕节妇孺皆知。每当七夕节到来之际,街上车水马龙,数日方休。宋代罗烨、金盈之辑的《醉翁谈录》说:“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填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我们从乞巧市购买乞巧物的盛况就可以推知当时七夕节的热闹景象。人们自初一就开始置办乞巧物品,到了临近七夕,乞

巧市简直成了人的海洋,车马难行。观其风情,绝不亚于古代最大的节日春节,这说明乞巧节是时人最为喜欢的节日之一。然而自近代以降,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原本隆重热闹的七夕活动屡遭冷遇,原因何在,据笔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 传统的断代

中国传统的七夕节以阴历作为节日日期,但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取消了农历纪年,而改为国际通行的公历纪年,把中国传统的节日改为按照公历庆祝,中国的传统节日受到强烈的冲击。我们不能否认“五四”运动的积极意义,但其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有过火的地方。胡适在1921年打出“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也一并受到否定,甚至在1929年政府把农历年全部废掉。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日益加大力度。到了60年代,终于走到极端,爆发了持续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破四旧,立四新”,凡有旧文化色彩的东西都打碎、砸烂、付之一炬。中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近代中国传统文化遭遇的历次劫难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断代,有几代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或是避之惟恐不及,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再像以前一样钟情属于传统文化的七夕节之类的民俗节日呢?

(二) 社会转型的影响

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7]自古以来,七夕节是属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节日,无论是七夕的巧果采购,巧芽的培育,巧桌的供奉,巧棚的搭建,还是穿针斗巧、蜘蛛卜巧,都具有浓厚的农业传统。在社会转型期随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不能指望人们在高层楼房中还要种巧芽、捉蜘蛛,也不能指望他们专门腾出几天的时间来过这个塑造女性社会性别的传统节日,因此传统的乞巧方式缺乏适合都市年轻人活动的“节日载体”,受到冷落也是必然。

(三) 西方文化的冲击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全球化也成为越来越热的一个话题。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在有的领域表现得手足无措,甚至是领土尽失,因此有的学者提出“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称谓来引起人们的警惕。在西方文化的冲击

下,中国传统节日渐渐衰落,如元宵节、端午节、重阳节等传统民俗节日日益受到人们的冷落,甚至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最隆重、最传统的春节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也是今不如昔,也因此有的专家、学者提出了“保卫春节”的口号,在此背景下,作为中国传统民俗节日的七夕节的衰落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相当深刻的问题,即我们非西方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对待西方文化冲击的基本态度问题,这将在下文中继续论述。

(四)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女性地位的提高

女性学者李银河认为女权主义最简单地讲就是强调男女平等。女权运动和妇女地位的提高是一种因果关系。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中兴女学、戒缠足以及改革婚姻,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主张,使几千年高压下的中国女性的生活有所撼动。辛亥革命前后,许多妇女刊物都提出男女平等是天赋的权利,“五四”运动更是把妇女解放运动推向高潮。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从宪法和法律上对男女平等的地位加以规定。甚至于女干部的最低比例、女人大代表的最低比例等都规定得非常明确。现在,女性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家庭中的地位都有了空前的提高。因此在女性地位空前提高的背景下,七夕节受到冷落也无足为怪。

(五)民俗的自然变迁

民俗的传承与变异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只有传承基础上的变异和变异过程中的传承,绝没有只传承不变异或一味变革不传承的民俗事象。民俗节日有着自身的变异规律,适应时代发展的民俗节日自然会得到传承,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自然会逐渐衰落直到消亡,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如缠足、溺女婴等劣俗恶俗被时代淘汰,以前的长袍马褂也早已变成西装革履,并没有谁觉得是不自然的事情。拿民俗节日来说,既有像清明节从解放前祭祖上坟到解放后增加祭扫烈士墓的传承中的变异;也有像上巳节、浴佛节等民俗节日的消亡;更有像父亲节、母亲节、情人节等新节日的兴起。当然也会有传统民俗节日如七夕节、端午节、元宵节等的衰落。

四、对民俗节日文化保护的思考

节日的变迁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而且一些传统的民俗节日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也会导致它们必然的衰落。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坐视其衰落而无所作为也无需作为了呢?事实并非如此。传统的节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虽然

有的节日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它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精神所在。我们可以改造它们的不合理内核,在文化多元化和中西文化交流中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复兴。

(一)挖掘传统文化内涵,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

传统的七夕文化是一种“男尊女卑”的文化,是一种确认女性社会性别文化,但它也有许多积极的成分,如它具有维护家庭稳定的功能,它弘扬的是一种爱情恒久的主题,因此一些民俗学家如汪玢玲、贺学君等就干脆称它为中国的情人节。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摒弃其不适应时代发展的“男尊女卑”的主题,而对其永恒的爱情主题进行弘扬,以“恒久之爱”作为其核心信息,这正好契合了中国牛郎织女传说的本源,也符合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也是对西方“快餐”爱情的一种反拨。对于像穿针引线、蜘蛛乞求等繁琐形式也要进行改造,为与西方情人节进行区别而改之以互赠具有中国特色的节日礼物如女送男情人结或荷包等,情人结代表有情人之间永结连理、永结同心,荷包则是古代女子送给男子的定情信物;男子则可以送给女子百合花,代表爱情长久,百年好合,也意味着性的交合,和中国传统七夕节的生殖崇拜功能相契合。进行了准确的定位,有了明确的节日载体,这对于节日的传承才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也是中国所有的民俗节日复兴的必由之路。

(二)传媒和民俗学者相配合,普及和宣扬民俗文化

自现代社会转型以来,中国传统节日的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以至于有的学者提出“保卫春节”的口号。在此前后,不少民俗学者如贺学君、乌丙安、陶立璠、刘魁立、宋兆麟等纷纷接受媒体的采访,对传统民俗节日如春节、七夕节、清明节等的保护与传承谈了自己的看法,传统节日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传媒应该重视和普及民俗文化,因为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和生命力所在。设立民俗频道和民俗栏目,然后邀请专家、学者访谈或撰文,或者进行民俗采风,以多样性的形式把鲜活的民俗文化传播给年轻人。

另外,传媒和民俗学者对于行将消失的民俗文化应该进行抢救、拍摄,以档案或胶片的形式保存起来,作为我们的民俗文化遗产,免得若干代过去,后辈连我们今天如何生活都不知道,那才是历史的悲哀。韩国把民俗民族遗产作为“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日本对传统民俗文化节日的重视,都从一个侧面给予我们

一个启示: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化并不矛盾。

(三) 加强对青少年的人文知识教育

传统文化断代之后只能对传统文化进行补课,而补课最好从小学生做起。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宁可从小就开始进行英语教育,却很少对我们的下一代进行民族文化经典的教育启蒙。我们宁可号召全民学习英语如考研、过学位、评职称等考英语,似乎谁都要学习那些有的人一辈子都用不上的英语,却很少有人考虑把我们的传统文化经典重视一下,或动辄对提倡重视传统文化经典的人斥之以遗老遗少。我们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实在太深。在国外,很难想象有人要打倒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打倒莎士比亚。而在中国,就有几十年我们非要把孔子打倒而后快。台湾、香港、新加坡、美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把孔子诞辰9月28日(公历)定为教师节,而我们却选了一个莫名其妙的9月10日,难道我们在刻意回避着什么?我们有时感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可我们是否也要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了解多少?难道还要等若干年之后我们都成了只会说汉语却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皮黄心白的香蕉人之后再来补传统文化的课吗?

中国传统文化是有糟粕,但其流传了几千年自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我认为,现在最缺乏的是传统的普及教育。许多人只知道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甚少。”^[8]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我们从中国文化经典中选取一部分优秀典籍著作从青年一代进行普及刻不容缓。教育部门在组织编写学生教材和学校在进行教学时,应该注意把更多的民俗文化融入进去,使学生在学校期间能接受更多的优秀民俗文化传统教育,使青少年更多地了解民俗节日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以增强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与保护意识。

(四) 加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自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以后,中国就开始了被动的西方化的过程。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在全盘西化、折衷派和复古派的论战中,仍是全盘西化占了上风。于是“打倒孔家店”,一切向西方看齐,就连流传几千年的文言文传统也一并废除,而提倡白话文,因此大量的汉语双字词不得不从日本重新借用。而建国后,我们又是几十年沿袭苏联的模式。“文化大革命”十年是重新走向封闭的十年,也是大革文化命的十年。改革开放后,一息尚存的传统文

化又被西方强势文化冲击得流离失所、手足无措。

纵观近代一百余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程,我们很少自主地走过自己的路。

我们应该坚持文化多元化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以开放的胸襟接纳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在引进来的同时也一定要走出去。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采取费孝通主张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策略。现在西方国家的汉学热,中国的京剧、武术、杂技、中餐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以及中国的民族民俗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异国游客的青睐等,这只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第一步。在西方圣诞节、情人节走向中国的时候,我们也要力争把中国的春节、端午节、重阳节、七夕节等传统节日推向世界。

(五) 政府立法的介入

民俗节日文化本是民间传承的传统文化,和官方是一个相对的范畴,但在现代中国,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俗节日的传承与保护问题上处于一种缺位的状态,在此背景下,有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等呼吁把清明、中秋、七夕、端午等民俗节日定为法定节日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民俗节日都需要定为法定节日,只有那些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且被民众广泛认可的民俗节日如清明、中秋可以定为法定节日并给予一定时间的假期,否则如果政府强制过节、忽视民众的心理感受只会适得其反。

政府立法的介入是传统节日民俗文化保护的最后一步也是迫不得已的措施,因此,我们要做的最主要的事情还是要唤醒民众的节日文化意识。

[参考文献]

- [1] 汪玢玲. 织女传说与中国情人节考释[J]. 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1): 4.
- [2] 杨琳.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
- [3] 吉星. 民俗传说纵横谈[M]//中国民俗传说故事.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5: 10.
- [4] 庄孔韶. 人类学通论[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5: 468.
- [5] 余敏芳. 宋代七夕词的民俗文化阐释[J]. 语文学刊, 2001(5): 3.
- [6] 殷文. 中国民俗文化中的性爱色彩[N]. 中国产经新闻报, 2004-09-03(2).
- [7] 郑杭生. 中国文化模式转型中的几个问题[M]//人类学与西南民族.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85.
- [8] 魏爱云. 综合创新: 传统文化的使命——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周桂细教授[J]. 人民论坛, 2005(5): 42.

[责任编辑:夏畅兰]